

## 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与苏联大清洗运动

张万杰

**摘 要:** 苏联大清洗运动中,政治清洗范围不断扩大,宏观上对共产国际产生的最大冲击是1938年解散了波兰共产党,运作程序完全不符合共产国际七大和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确定的组织方式和原则。经详细考察,遭大清洗运动扩大化打击和镇压的共产国际人员包括执委会工作人员、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反法西斯主义者。并非如以往一些研究者所言,共产国际在这场大清洗运动中基本没有作为,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领导层在严酷环境中冒着巨大危险,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营救被捕者。

**关键词:** 季米特洛夫; 共产国际; 斯大林; 大清洗运动

**作者简介:** 张万杰,法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站博士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季米特洛夫政治思想与实践研究”(15CKS02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5批面上一等资助项目“季米特洛夫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2014M550332)。

**中图分类号:** D16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3.004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于苏联掌权后的政治强人斯大林推行了国家高速工业化战略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同时,还在联共(布)党内斗争中采取强制性压制措施,发动了针对“藏匿”在内部的所谓“人民敌人”的大清洗运动。政治大清洗早在1927年斯大林主导反对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1929年清除布哈林派时就已经开始。30年代,在险恶的国际环境、激烈的党内争论以及斯大林个人性格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从1934年底到1938年秋的近四年里,苏联国内先后出现了两次更大规模的清洗浪潮。运动打击对象开始主要是党政军高级干部和苏联知识界精英,在清洗中由情报机构及内务安全部门严密控制司法机关和法定程序,滥用权力,逼供诱供,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随着运动的不断推进,政治清洗对象范围不断扩大。这一残酷的政治运动也波及到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世界性共产党——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后期(1935—1943)担任执委会总书记的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亦曾在运动中承受重大压力,受到很大冲击。以往有研究者言,受苏联高层操控的共产国际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基本没有作为;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层在严酷环境中冒着巨大危险,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营救受迫害者。

## 一、大清洗运动对共产国际组织体制产生的最大冲击

宏观而言,苏联大清洗运动对共产国际组织体制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最大冲击是 1938 年波兰共产党被按照非正常程序解散。

在此之前,斯大林曾无根据地指责过波兰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有托洛茨基主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思想倾向,持反对苏联政治立场;早在 1933 年时就对波兰共产党领导人耶·切舍伊斯科-索哈茨基等进行了肉体上的镇压,“1938 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议只是一个幌子,它掩饰了 1937 年斯大林对波兰共产党人的专横暴虐”<sup>[1]</sup>。1938 年 1 月,莫斯科《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 1 期发表了作者为亚·斯文茨基的题目为《华沙通讯:活动中的奸细》的署名文章,文内断言,由于波兰警察当局使用安插内奸坐探的手法,波兰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内混入了“敌人的代理人”“奸细”,文章还强烈批评了波兰共产党在西乌克兰问题和白俄罗斯问题上所实行的政策,认为其政策的目的是“恶化波苏关系”<sup>[2]</sup>。1938 年 2 月至 3 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波格丹诺夫在西班牙召集召开了由国际纵队中的波兰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第一次把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通知了波共党员,同时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主要是负责解散波兰共产党国内组织的工作;4 月至 5 月间,三人小组返回波兰,解除了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领导职务,解散了部分国内党组织;7 月 2 日,波兰共产党临时领导机构召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特使于 6 月带来的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并被迫一致同意服从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解散波共的决定。

解散波兰共产党表面上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做出的决定,由其决定某一国家共产党支部的废除问题在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尚属首次。先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决定,再由其本国驻共产国际代表下达通知并开始组织运作,继而派出共产国际的特使传达执委会关于组织解散的立场,最后该国国内党员被迫一致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作出的决定。这样的组织运作程序完全不符合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组织领导方式,不符合从 1935 年七大开始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所倡导的加强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性的原则。季米特洛夫为总书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当时明显是受到了某种外力的压制才通过了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议。许多解密资料也表明,在 1937 年和 1938 年间,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曾遭受过斯大林和苏联方面施加的沉重压力,季米特洛夫本人也曾备受非难与指责。

## 二、遭大清洗运动打击的共产国际人员

随着联共(布)党内政治清洗运动的开展、国际政治局势变化和苏联对外政策调整,大清洗运动也很快扩大波及到共产国际内的工作人员及生活在苏联的外国政治侨民。20 世纪 30 年代,遭运动打击和镇压的与共产国际有关的非苏联人主要包括执委会工作人员、在苏联获准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国外政治流亡者(主要包括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反法西斯主义者)。

大清洗运动中镇压外国侨民及政治活动家事件的见证人、苏联著名国际专栏撰稿人恩斯特·亨利，曾发表文章要求详尽讲述斯大林在二战前镇压非苏联国籍的革命活动家、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后果<sup>[1]</sup>。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司法机关在1937年下半年就已逮捕了德国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波兰共产党等党的一些领导人或革命活动家，这些人主要包括：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胡·埃贝莱因、赫·雷默尔、海·诺伊曼、弗·舒尔特、格·基彭贝尔格，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米·戈尔基奇、菲·菲利波维奇，匈牙利国际共运著名活动家库恩·贝拉，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爱·普罗赫尼亚克、亚·帕申、尤·连斯基、姆·科舒特斯卡娅等。1939年8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许多1933年后到达苏联的反法西斯人士也被苏联情报安全机关镇压，其中包括在本国国内抗击法西斯遭到失败而到苏联避难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军事组织成员。遭打击和镇压的国际活动家还包括：共产国际创始人、瑞士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弗里茨·普拉廷，原希腊共产党总书记阿·康塔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伊朗共产党领导人阿·苏丹·扎德，曾担任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的弗·巴伊阿基、德·博卡尼、伊·克连、伊·拉比诺维奇、什·萨巴多什，第一个获得列宁勋章奖励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勒·阿夫拉莫夫，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克·拉科夫斯基（保加利亚人）、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斯托莫尼亚科夫（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杰出活动家亚·多勃罗贾努-格里亚，芬兰共产党创始人格·罗夫诺、阿·绍特曼等。

此外，在被苏联吞并之前，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等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革命活动积极分子也遭到了大规模的镇压。南斯拉夫曾提出约有800多名共产党员在大清洗运动中牺牲；华沙出版的多卷集著作《波兰工人运动活动家人名录》中的头两卷表明，波兰革命者的牺牲人数成千上万；意大利共产党资深老党员安东尼奥·罗阿济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曾提到，有100多名居住在苏联的意共党员被捕和被送往集中营<sup>[1]</sup>。在受镇压的意共党员和移民中，多数是从意大利逃到苏联并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员，其中丹特·科尔内利因被指控曾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分子而于1935年被逮捕，到1960年时才获释并恢复名誉；负责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络的意大利共产党知名党员、机械工人朱赛佩·里莫拉于1938年初在旅馆被捕，后死于狱中，死因成谜；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的内兄、熟练工人、移民俱乐部的领导人保罗·罗博蒂于1938年3月4日被捕，遭到严刑拷打，要他承认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交给他的“反革命任务”，这很可能是想指控陶里亚蒂本人而采取的讹诈行动<sup>[3]</sup>。日本共产党人山本和他的妻子关松，以及另一位在德国加入过德国共产党而后又到苏联的日本共产党党员国崎定洞，3人于1937年在苏联受到毫无根据的怀疑，遭到逮捕；国崎定洞于1937年12月死于监狱中，山本被转移到医院后于1942年4月病逝，时年47岁，关松在1956年被恢复名誉；为了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而于1938年1月从库页岛越过国境进入苏联的日共党员杉本良吉，也在1939年9月被非法逮捕，于同年12月死于狱中，时年32岁<sup>[4]</sup>。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侨民也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遭到过迫害。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立三，在1938年2月23日被苏联国家安全机关逮捕，审判机关以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日本

间谍、恐怖集团首脑的罪名指控他<sup>[5]</sup>。1938年,苏联发生了大规模迫害中国侨民的浪潮,在海参威,“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人员根本连证件都不询问,就可以在大街上、公共汽车上抓中国人,他们从整幢整幢的简易房里逮捕工人,包括妇女和年幼儿童”;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和在苏联各大学学习的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同志都遭逮捕<sup>[6]</sup>。

可见,在大清洗运动中遭镇压的政治侨民的范围和规模很大,其中包括了许多国家共产党内的精英。

1938年3月,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匈牙利著名国际共运活动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叶夫根尼·瓦尔加写给斯大林一封信,这封致斯大林并抄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的亲笔信这样描述道:“仇恨外国人的情绪正在蔓延。外国人被不加区别地看成是间谍,外国孩子在学校被骂作法西斯分子”“越来越多的一部分原先的干部在苏联被捕”“大规模的逮捕使自由生活在苏联的干部极为消沉和惊惶失措。这种消沉情绪已经影响到了绝大多数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甚至蔓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某些成员中间”;对尚未遭逮捕或镇压人的情绪,亲笔信写道:“一个诚实的共产党员虽确信某个被捕的人是无辜的,希望弄清误会,却无能为力,因为他不知道被捕者被指控犯什么罪,没有办法接近主管调查的人”“由于人们不知道逮捕和判处他们的同胞凭的是什么证据,因此一种危险的恐慌气氛正在苏联的外国人中间扩展开来”“甚至最忠诚的外国革命者也不能确信自己是自由的。许多外国人每天晚上都收拾好自己的物品,以准备可能的逮捕。很多人由于终日恐惧已经变得半精神失常,不能工作”;亲笔信还以匈牙利为例,说明一国人员在苏联遭受逮捕的状况:“在匈牙利的同志从苏联方面听说,从匈牙利逃出来或从监狱交换出来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只有4人是自由的,而10人已经被捕;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只有2人是自由的;几百名匈牙利的工厂工人——政治流亡者——已经被捕”<sup>[7]</sup>。这封亲笔信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外国侨民遭受大规模逮捕和镇压的情况,也反映出那些敢于对大清洗运动提出疑问的人的苦闷情绪。

### 三、险恶环境中季米特洛夫的营救努力

以往有研究者曾言,直接受苏联高层操控共产国际在这场政治大清洗运动中是基本没有作为的。大清洗运动中,在关于审查共产国际内部人员问题上,季米特洛夫与共产国际执委会面临着来自于苏联方面的沉重压力。斯大林授意苏联情报机关坚持“毫不手软”地侦查共产国际内部潜在的所谓“人民敌人”,不信任任何曾经参加过反对派或曾遭到敌对方逮捕的人。困境中的季米特洛夫,还受到斯大林的非难,同时一些伪造的指控让季米特洛夫怀疑并审查共产国际执委会陶里亚蒂、曼努伊尔斯基等领导人以及国际工运其他著名活动家。

季米特洛夫冒着巨大政治风险多次亲自为被捕的外国政治流亡者写信辩护;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也曾多次设法营救一些无端遭逮捕的苏联人。多次以各种方式向苏联内务部、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发出呼吁,要求重新审查一些共产国际人员、外国政治侨民和苏联公民的案件。在

1939年一年，他就递交了135份这类请求和呼吁信。他经常频繁地就某一案件向苏联内务部等机关写信，以便证明某人是遭无辜逮捕的。这些努力得到的答复通常是没有回应，或是被告知此前的判决正确，很少得到同意被安排复审和释放。

后来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即有很多文件是关于季米特洛夫营救遭镇压的共产党人和国际主义者的书信<sup>[7]</sup>。

1938年3月21日，保加利亚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从1926年起就一直生活在苏联的共产党员赫里斯托·卡巴克奇耶夫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季米特洛夫和保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科拉罗夫于当天立即写信给苏联内务部副委员，信里说“现将科拉罗夫同志关于老资格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员赫里斯托·卡巴克奇耶夫（于今日被捕）的信寄给您，我也可以作证，我本人知道赫·卡巴克奇耶夫是一名最正直的共产党员。我们请求您亲自研究此案，并加紧查明，因为被捕者病得很厉害”。寄出此信，又经过几天调查之后，赫·卡巴克奇耶夫被释放了出来。

季米特洛夫后来的一些书信内容表明，叶夫根尼·瓦尔加于1938年3月写给斯大林的长信中所反映的许多具体情况，很可能也是他通过季米特洛夫了解到的，得到过他的帮助。因为瓦尔加的亲笔信寄出以后，季米特洛夫很快又于4月26日写信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安德列·日丹诺夫，提请他注意，这种描述被迫流亡异国的人，包括生活在苏联的政治流亡者的说法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4月23日，季米特洛夫把他收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威廉·皮克的信转交给内务部领导人弗里诺夫斯基，请求他对被捕的15位德共党员尽快再进行审查，以便尽快释放他们。这其中有两位曾在1933年被德国纳粹分子投入集中营，曾作为证人在莱比锡审判中发言，驳斥过纳粹对德共的污蔑，并曾帮助过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揭露国会纵火案阴谋。

1938年12月7日，拉·贝利亚接替叶若夫担任苏联内务部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随即就已被捕的一些保共党员和其他政治流亡者一事给这位新任人民委员写信，信中说：“我向您转交科拉罗夫同志和保共中央国外局的一封信和一份名单。我恳切地请求您加快调查这些案件和研究早已提交的名单。我相信，经过适当的调查之后，常常会查明，这些忠诚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成了人民敌人的阴谋的牺牲品”。此前，被捕的一批保共党员中仅有20人被释放，季米特洛夫提交的名单中还有131个新被捕的政治流亡人员。

1940年夏天，季米特洛夫将一份列有122人的新的被捕名单寄给了马林科夫；1941年，他又把一份被苏联内务部逮捕的132名保加利亚人的名单交给了联共（布）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请求重新审查他们的案件；同时，他还指出，在被捕的其他国家的政治侨民中也有不少忠诚的共产党人，应该“纠正对这些人所犯下的错误”。1941年2月7日，他在写给安德烈耶夫的信中说，“还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即在被逮捕的其他民族（德国人、奥地利人、巴尔干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人）的政治流亡者中的确有不少真正的、忠诚的共产党人，应当重新审查他们的案件，应当改正正在对待他们方面所犯的错误”，还建议安德烈耶夫接纳和听取莫斯科军区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雅库宁、吉特曼和库洛夫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要查清政治流亡者案件的工作没有取得实际的进展，因为即使在指控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时候，在绝大多数场合，案件依然并没有停止，被

判刑的无辜者并没有获释”。

季米特洛夫曾设法营救过的人中有一些人的命运非常悲惨,如著名物理学家、奥地利共产党员弗兰茨·奎特内尔,他于1938年3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1940年4月19日,几位奥共党员以奥地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写信给季米特洛夫,请求他设法营救这位1918年即已入党的奥地利共产党资深党员。季米特洛夫很快就于4月22日写信给苏联检察长米哈伊·潘克拉奇耶夫,信中写道,“现送上由奥地利共产党的几名负责的工作人员的一份关于弗兰茨·奎特内尔的申诉材料,请您关心一下此案,如果可能的话,予以复查。请将结果告我”;5月11日,他收到答复说,根据审讯,共产国际为之申诉的那个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供认他一直从事反苏的间谍工作”,这个奥地利科学家于5月31日“当成间谍而被枪毙”。弗兰茨·奎特内尔这位无辜的资深奥共党员直到1956年8月才被正式恢复了名誉。1941年7月,意大利共产党员、海员工会的领袖马努埃尔·富恩托斯被内务部拘捕,并被送往集中营。1943年2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几位意共党员的共同请求,季米特洛夫写信给苏联检察院,要求“重审此案,并释放意大利共产党党员马努埃尔·富恩托斯”;5月28日,当他再次询问此事时得到消息说,此人“作为一个与苏联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的国民被拘禁在新罗西斯克”。1944年,马努埃尔·富恩托斯被释放出集中营,但不久逝世。

大清洗运动中的潜规则是,如果一个人被内务部门或情报机关怀疑或逮捕,其他人一般都会与之切割关系,都须认定此人是“人民公敌”或“叛国者”。如果某人敢于证明此人的清白或无辜,那么也即意味着自己也是共谋者。在恐怖气氛之下,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所做的营救工作也使他不得不设想被捕的命运有一天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鉴于此,为保证共产国际日常工作的继续开展,他甚至拟定了共产国际下届领导人员组成名单,并打算只吸收当时居住在西方国家的人参加共产国际的下届领导<sup>[8]</sup>。

经以上详细考察可见,并非如以往一些研究者所言,直接受苏联高层操控共产国际在这场大清洗运动中基本没有作为,以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层在严酷环境中冒着巨大危险,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营救被捕者。

#### 参考文献:

- [1] 阿·拉特舍夫. 共产国际的悲剧 [J]. 肖雨潞,译. 国际共运史研究, 1989 (3): 66, 10.
- [2]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 共产国际大事记 (1914—1943)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496.
- [3] 乔治·阿门多拉. 意大利共产党历史 (1921—1943年) [M]. 黄文捷,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361.
- [4]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 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 上 [M]. 段元培,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91-92.
- [5] 李思慎, 刘之昆. 李立三之谜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246-248.
- [6] 沈志华.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 (1917—1991): 上册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353.
- [7] 弗·菲尔索夫. 无畏对抗无法——共产国际档案中有关营救遭受斯大林镇压的共产党人和国际主义者的文件 [J]. 刘庸安,译. 国际共运史研究, 1989 (3): 67-72.
- [8] 帅永章. 苏联学者谈共产国际的若干历史问题 [J]. 帅永章,译. 理论前沿, 1989: 75.

【下转第 91 页】

[9] 景天魁. 大力推进与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构建底线公平的福利模式 [J]. 理论前沿, 2007 (18): 5-9.

[10]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56-57.

## Multiple Dynamic Mechanism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of the Elderly's Migration

Wang Lingping, Feng Xiaotian, Li Hongfang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immigrant elderly should be researc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thinking” and be linked with the unique featur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ity centralism causes the migration of the children of the elderly, which is the premise of elderly's migration. The children face great living pressure resulted from the marginal status of Chinese labor divis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and the corrosion of consumerism. Migration of the elderly is a family strategy to cope with risks made by developmentalism welfare of the authoritarian country.

**Key words:** migration of the elderly; immigrant mechanism; family thinking; compressed modernization

(收稿日期: 2017-03-02; 责任编辑: 沈秀)

.....  
【上接第 24 页】

## Dimitrov, Communist-International and Soviet Political Cleaning Campaign

Zhang Wanjie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 of Soviet political cleaning campaign, the scope of political cleaning continued to expand. The greatest impact of the movement on the Communist-International wa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olish Communist Party in 1938.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were totally incompatible with the organizational modalities and principles established by the 7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International and Dimitrov. The Communist-International staff, including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taff, foreign communist refugees, Social-Democrats and anti-fascists, was stricken and oppressed. It is not, as some researchers have said in the past, that the Communist-International did not act in this campaign, whereas Dimitrov took a variety of measures to actively rescue the arrested in the harsh environment.

**Key words:** Dimitrov; Communist-International; Stalin; political cleaning campaign

(收稿日期: 2016-11-20; 责任编辑: 晏小敏)